

簡

牘

研

究

譯

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

# 简牍研究译丛

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简牍研究译丛

第一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81千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统一书号：11190·097 定价1.30元

## 编者说明

我国古代简牍是研究从战国到汉、晋这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典章制度的第一手珍贵材料。

从十九世纪末以来，我国先后在新疆塔里木河、尼雅河下游、罗布泊和甘肃敦煌、居延等地区，发现了不少汉、晋木简。其中，以一九三〇年居延出土的一万余支汉代木简，尤为驰名。解放以后，在内地和边疆，又发现了大批的古代简牍。如：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和湖北随县等地出土的战国竹简；湖北云梦出土的秦代竹简；湖南长沙、河南陕县、甘肃武威、甘肃居延、江苏连云港、山东临沂、河北定县、湖北江陵、安徽阜阳等地出土的汉代竹简和木简；新疆吐鲁番、江西南昌等地出土的魏、晋简。其中，甘肃居延新出土的汉简近两万支。最近，又在甘肃敦煌和青海大通出土了一批汉代木简。预计我国古代简牍今后还将陆续出土。

我国古代简牍的大批出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近八十年来，中外学者对我国古代简牍进行了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专著和论文。截至一九七八年底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中外发表的论著（包括中文、日文、英文、法文、德文）已达五百多种。

目前，居延新出土的近两万支汉简，有关单位正在进行系统整理和释读，不久即将出版。出版以后，国内外关于我国古代简牍的研究工作，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我国古代简牍的研究，和敦煌学一样将发展成为一个专门学科。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古

代简牍的研究，加强中外学术交流，我们编辑出版《简牍研究译丛》，有计划地选译国外有关我国古代简牍研究的有参考价值的论著，以满足国内广大史学工作者的需要。

本辑重点介绍森鹿三、大庭脩等日本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著作，同时也介绍了英国学者鲁惟一的论文。《译丛》下一辑将继续介绍外国学者研究我国古代简牍的成果。

第一辑由姜镇庆、余太山、孙言诚等校订译文，谢桂华负责编辑定稿。在编译过程中，曾得到林甘泉、张政烺、李学勤和于豪亮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并蒙张政烺先生题签。特别应该感谢日本学者大庭脩先生的帮助，《中国出土简牍研究文献目录》是大庭脩先生送给张政烺先生的。在翻译该目录时，参阅过李学勤同志的译稿，还得到了张书生、邹如山、耿升等同志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翻译时，虽然发现原文中所引简牍释文有一些错误，但为了尊重原著，均未改正。原文各篇体例不尽一致，本书亦未尽予统一。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  
于1981年10月

## 目 录

### 编者说明

居延出土的王莽简…………… (日) 森鹿三著 姜镇庆译 ( 1 )

关于令史弘的文书…………… (日) 森鹿三著 姜镇庆译 ( 21 )

### 居延汉简集成之一

#### ——破城子出土的定期文书 (一)

…………… (日) 永田英正著 余太山译 ( 39 )

论居延简所见的马…………… (日) 森鹿三著 姜镇庆译 ( 75 )

### 论居延出土的卒家属廩名籍

…………… (日) 森鹿三著 金立新译 ( 100 )

### 论敦煌和居延出土的汉历

…………… (日) 森鹿三著 姜镇庆译 ( 113 )

汉简职官表…………… (日) 藤枝晃著 孙言诚译 ( 129 )

汉代的畜夫…………… (日) 大庭脩著 姜镇庆译 ( 171 )

### 试论居延汉简所见的候官

#### ——以破城子出土的“诣官”簿为中心

…………… (日) 永田英正著 孙言诚译 ( 197 )

爰书考…………… (日) 大庭脩著 姜镇庆译 ( 223 )

- 汉代的一些军事文书……(英) M.鲁惟一著 张书生译 (245)
- 汉代屯田制的几个问题  
——以武帝、昭帝时期为中心  
……………(日) 尾形勇著 吕宗力译 (262)
- 中国出土简牍研究文献目录  
……………(日) 大庭脩著 谢桂华译 (297)

# 居延出土的王莽简

(日) 森鹿三

—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从居延汉简中挑选出王莽时期的简。

王莽篡夺刘氏西汉王朝，创建国号为新的王朝，是在公元八年，因此王莽把这一年称为初始元年。在居延汉简中发现了下列有初始年号的简：

(1) 王路堂免书 初始元年十一月壬子 三一·二·六<sup>①</sup> 图  
三〇一 文六七 甲一六六八

壬子是九日，当时王莽还没有改元为初始，应该是居摄三年，所以这支简大概是后来改写的。<sup>②</sup>王莽在十一月戊辰（二十五日）举行了登基典礼，宣告以十二月一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一日。王莽将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以来以建寅之月为岁首的惯例，改为以建丑之月为岁首。汉代提倡三正论这种学说，认为夏、殷、周三代的正月即岁首都不同，夏朝以建寅之月为正月，而殷朝以早于建寅一个月的建丑之月为正月，周朝又以再早一个月的建子之月为正月。因此，王莽篡夺汉朝之后，立即模仿殷灭夏以后把建丑之月作岁首的作法，而改为殷正。这样，王莽一代一直使用殷正，但王莽灭亡之后，又恢复了原来的夏正。我发现记载始建国年号的简有以下九支：

(2) 辨衣裳审棺椁之厚营丘壠之小大高卑薄厚度贵贱之等级



- 始建国二年十一月丙子下 二一〇·三五 图二九九  
文六七 甲一一五二
- (3) 以始建国二年六月乙巳除为史尽其九月当三月 二六·  
一三 图一四〇 文四五六 甲一九九
- (4) 始建二 一一〇·一七 图一九四 文三八五
- (5) ●始建国三年正月驿马病死爰书 九六·一 图九六
- (6) 始国三年四月丙戌 二四〇·一七 图四二九 文五六  
八
- (7) 百目始建国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定作簿柱□□评□ 五〇  
六·一四 甲二〇〇五
- (8) 始建国三年 二一〇·一〇 图二七九 文五六七 甲  
一一六一
- (9) 人粟大石二十五石 车一两 输甲沟候官 始建国五年六  
月 令史受赏家当遂里王护 一六·二 图三〇四 文  
三〇六
- (10) 食米二十二石 车一两 □候官 始建国六年二月己丑杨  
□守尉 二六六·三二 甲一三九三

虽然王莽在始建国六年改元为天凤元年，但这九支简也有时在天凤之上冠以始建国，还有时在天凤之下添“上戊”两个字。“戊”是土之兄，在五行中属土行。居延简中有一支载有如下文字的简：

- (11) 新室以土德代火家 二二五·三二 图三〇七 文六〇  
九

意思是说，王莽的新朝向天下宣告：它以土德代替了火德的汉朝。因此，王莽的新朝尊奉一切属于土行的事物，方位尊重中央，颜色尊重黄色。王莽之所以选戊日举行登基典礼，也是因为祝愿代表土德的新王朝万事吉利的缘故。并且新朝还把干支的顺序也加以改变，过去是从甲子开始，它们则是从戊子开始。这姑

且不去管它，不过，天凤年号，说得具体一点，即始建国天凤上  
戊年号一共延续了六年。记载这个年号的简，有以下这些：

- (12) 制诏纳言其□官伐林木取竹箭 始建国天凤元年十二月戊  
寅下 九五·五 图二八〇 文六一 甲五七〇
- (13) 始建国天凤二年六年 一五四·一 图二五五 文五六  
七
- (14) 甲沟候官□新始建国天凤上戊二年 吏□□至下士秋射名  
二一〇·三四 图五九六 文五〇三
- (15) 居成甲沟第三爨长间田万岁里上造冯匡年二十一 始建国  
天凤三年闰月乙亥除补止北爨长 二二五·一一 图三  
〇八 文四六八
- (16) 戊五年十月丁丑除□ 二三一·三九 图二八四 文四  
八五
- (17) 南书一封天凤六年三月□亥 □□□钱约肩掾□非□□  
□□□□斛斗付□ 三四六·四四 图八 文一一九
- (18) 始建国天凤□ 三九·二九 图三四六 文五六七
- (19) 始建国天 一五四·三一 图二五七 文五六七
- (20) 始建国天马丞前百 一五六·二六 图一七〇 文五六  
六

最后三支简究竟是哪一年的，虽不知其详，不过，这显然是  
天凤年间的。但是，象简（16）那样只凭一个“戊”字就把它看  
做是天凤上戊，也许使人产生异议。然而，天凤以后的地皇上戊  
只到了四年，王莽就灭亡了，所以我认为把戊五年看做是天凤上  
戊五年，大概是没有错的。因此我把这三支简还是放在这一组。  
记载地皇上戊年号的简有以下十支：

- (21) 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 七一·二五 图一六九 文五  
六六
- (22) □部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三年二月邮书簿 一一〇·一〇

图一九四 文四九三

- (23) 国地皇上戊三年五月乙巳除 二七·一六 图五〇六  
文四七八 甲二〇六
- (24) 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三年六月甲戌据译 一五四·三五  
图二五五 文五七
- (25) 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三年□月朔甲申候虜长郭崇谨坐簿如  
牒敢言之 三九四·三 = 四六九·一 图一二四 文三  
三
- (26) 始建国地皇上戊三年 四八六·一B 图三一〇 文六  
九
- (27) 新始建国地皇上 一五六·二四 图一七〇 文五六六
- (28) □始建国地皇 六一·一二 图五九七 文五〇三
- (29) 建国地 三七一·六 图一〇九 文五六六
- (30) 第十六虜长居延利上里郑阳年卅七 始建国地 二三  
一·一〇六 图五九二 文四八二

王莽亡于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而反王莽的势力拥戴刘玄，在这一年三月（夏正为2月）改元为更始。在居延简中，更始二年的简有三支。我在大约有一万支居延简中，除了上面所引的简（11）以外，共挑出了二十九支简，它们都是载有王莽时期——从初始元年经始建国、天凤到地皇四年这前后十六年——的年号的简。现在我想以这二十九支有纪年的简为线索，尽量挑出可以看做是王莽时期的简。不过，在挑选之前，由于上面已挑出的简中有两支与前述殷正特别有关的简，因此我想先对这两支简稍加说明。这两支就是简（2）和简（12），它们都分别引用了《吕氏春秋》的《孟冬纪》和《仲冬纪》的文字。<sup>③</sup>我想首先提醒读者注意：这些文字虽然基本上与《礼记·月令》相同，但简文毋宁说接近于《吕氏春秋》。简（2）的“营”、“小大”、“薄厚”以及简（12）的“林木”与《吕氏春秋》相同，而在《月

令》中，它们分别作为“整”、“大小”、“厚薄”、“木”。根据这种古代典籍来颁布政令，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王莽由于用了殷正，而把相当于夏正十月的孟冬政令于十一月颁布，又把相当于夏正十一月的仲冬政令于十二月颁布，这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件有趣的事。顺便说一句，始建国二年有闰月，在《通鉴目录》中，把闰月置于十一月后面，但是，在汪日楨的《长术辑要》和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中，闰月则置于十月之后。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个正确，关键就在于简（2）中出现的始建国二年十一月丙子这个日子的干支。如果按照汪日楨和陈垣的说法，把癸亥朔的闰月置于癸巳朔的十月之后，再把壬辰朔的十一月放在癸亥朔的闰月之后，那就等于说丙子就成了四十四日，十一月就不存在丙子日子了。但按《通鉴目录》的说法，把癸亥朔这个月当做十一月，再把它后面的壬辰朔当作闰月，则十一月丙子就是十四日，这就合理了。应该说《通鉴目录》的说法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如果再进一步推算，十一月丙子也许就是立冬的节日。由此类推，简（12）所载的“伐林木取竹箭”，据《吕氏春秋》的说法，则是照例在日短至即冬至所要办的事情，所以下达这个制诏的戊寅日，大概就是冬至。如果按照我的解释，这一天是天凤元年十二月戊寅，那末就是十日，不过，我这个解释会引起人们产生不同的看法。劳榘三次释读都把它读作天凤二年十一月戊寅，但遗憾的是，在甲午朔的这一月，并不存在戊寅之日。因此，我以简（2）为线索，认为简（12）必须是十二月，并且查对了天凤年间，在十二月有戊寅的年份是天凤元年、二年、五年。因而我把简（12）解释为天凤元年十二月。可惜有一部分原简的年月部分破损严重，很难释读。如蒙赐教，则不胜幸运了。另外，在简（12）开头所载“纳言”二字是指九卿之一的大司农，在王莽时期，先把大司农改为“羲和”，后来又改称“纳言”。

## 二

我想用已挑出的二十九支有纪年的王莽简为线索，从多达一万支的居延简中再找出一些能认为是王莽时期的简，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有一种方法就是要着眼于原简编号。简（1）的三一·二·六、简（2）的二一〇·三五等都是原简编号，不过，我不大了解原简上的这些整理编号的来历。大概贝格曼从保留在居延即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要塞和烽火台等遗址中采集到这些简时，已经作过初步整理，但是现在的原简编号似乎不是原来由贝格曼所定的整理编号，而好象是中国根据贝格曼的编号，再单独进行整理时编出的。因此，可以认为在上方下方两种编号中，上方编号表示同一个地点，下方编号则是对同一地点出土的简，适当地排出顺序时的编号。所以，我认为上方编号相同的简，大概其年代也相同。其中，既有原来是一件文书，但因小穿绳断了而变成一支一支零散的简，也有一支简断成了破片的。这种情况已为过去的汉简研究所多次证实。当然现在在我挑出王莽时期的简时，采用这种着眼于原简编号的方法也是有效而恰当的。但是应该注意：即便在同一个上方编号的简中，也有的简涉及的年代相当长。例如，与简（3）同样以二六为上方编号的简约有二十来支，但是其中却有写着神爵二年的有纪年的简（如二六·一六 图一四〇 文四五六）。神爵二年是公元前六十一年，比简（3）的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要早七十年。此外还有写着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的有纪年的简（如二六·一 图一四〇 文一六九 甲一八七），由此可知上方编号为二六的简涉及到相当长的年代。因此，上方编号相同的简，尽管是出土地点相同的简，却不一定是年代大致相同的简。

编号与前一节列举的有纪年简相同的简中，理应有大批王莽简，但在挑选这些王莽简时必须考虑到刚才所谈到的情况。不

过，即使是这样来挑选，也需要有一种更具体一些的挑选标准。因此，我首先想到的一种有效方法就是以王莽时期的制度改革和名称变更为标准（如前面所举的一些例子）来进行挑选工作。如前所述，在王莽时期，名称的变更也不只是职官名，就连地名等也经过了彻底的变更，这一点根据《汉书·地理志》就可以知道。通览刚才谈到的有纪年简，就看到在简（9）和（14）中有甲沟候官，简（15）中有甲沟这种地名，可以看出这两个名称就是居延简中经常出现的甲渠候官和甲渠，而在王莽时期被更改了的名称。王莽把渠改为沟，这种作法根据他把北地郡的义渠道改为义沟，把朔方郡的渠搜县改为沟搜这一事实也可以证明。不过，我由此而得到了一种挑选王莽简的标准。因此，我就寻找载有甲沟候官的简，结果发现了以下十支这样的简：

- (31) 甲沟官 □□印 三九·三 图三五二 文一五一  
 (32) 甲沟官 三九·四 图三四七 文一五〇  
 (33) 甲沟官 李赞印 四月庚戌卒同以来 三九·五A 图三五二 文一五一  
 (34) 甲沟临木候□□ 四八·二 图三六六 文四七二  
 (35) 三月丁未甲沟鄴守候君写移三月狱如律令 九五·四 图二八一 文六一  
 (36) 甲沟候官塞庶士候长戊子□ 一一〇·一八 图一九四 文一九七 甲六二七  
 (37) 辅平居成甲沟候官塞庶士候为辅平属居成三十井候官塞庶士□庶士候 一五六·四 图一七〇 文一九〇  
 (38) 城仓以见 巳入正月三日 谷三百二十属付甲沟候吏斛十人二月长吏迎□ 二一〇·一三 图二七五、二七八 文三〇三、五一三  
 (39) 鄴候□ 甲沟鄴候□□ 二六六·二一 图三一三 文七一

(40) 二月乙亥甲沟鄆候放敢言之谨写移敢言之／尉史普 三  
一二·二三 图二五四 文五七 甲一六七三

这些简虽没有纪年，但可以把它们看做是王莽简，因为就是拿这些没有纪年的简和前述有纪年简的上方编号对照起来，也可以证明它们是王莽简。具体地说，简(31)、(32)、(33)同简(18)一样，都有“三九”这个上方编号，同样，简(35)和(12)；简(36)和(4)、(22)；简(37)和(20)、(27)；简(38)和(2)、(8)、(14)；简(39)和(10)；简(40)和(1)都是上方编号相同的简。只是简(34)与其上方编号“四八”相同的简有十三支，但几乎都是断片，其中也不存在有纪年的简。

王莽时期居延改名居成一事，虽见于《汉书·地理志》，但是象简(15)、(37)这样能证实居延改名的活生生的史料却在事隔二十个世纪之后又出现了，这是一件令人极为高兴的事情。这个“居成”也是挑出王莽简的一个标准。不过，除上述两支简外，还能看到写有“居成”两个字的简，却只能找到以下一支：

(41) 居成间田造昌里上造王□ 四八二·一一 图五〇五  
文四七八

这支简中所说的“间田”，在前述简(15)中也能见到，但其典故出自《礼记·王制》，是指未封之地。《汉书·王莽传》载：“诸侯国间田为黜陟增减”，可知在诸侯封土之间的土地叫做间田。意思是说，对有功的诸侯增封土地，而没收有罪者的领土作为间田，归根到底皇帝直辖的郡县就是间田。因此，“间田”也是挑出王莽简的一个有力的标准，但除上引两支简外，却没有发现写有“间田”的简。<sup>④</sup>此外，间田下面的“万岁里”和“造昌里”等等是属于居成县的里，而里下面的“上造”，在八等民爵中是倒数第二位。

前述简(37)写着“辅平居成”，据《汉书·地理志》载，

“辅平”就是原来的酒泉郡，而在王莽时期改为此名。居成即居延县，在西汉时期属于张掖郡，但在王莽时期改属靠西边的酒泉郡了，万没有想到，这种情况由于简（37）的出现而被发现了。不过，《汉书·地理志》所载“酒泉郡莽曰辅平”如果有误，则另当别论了。据《汉书·地理志》说，张掖郡在王莽时期改名为“设屏”。因此，我在居延简中检查了有没有写着“设屏”二字的简，结果发现下面一支简，似乎是属于这种简：

二合檄张掖城司马毋记日诣设屏大尉府

（42）南书五封 一封诣右城尉

一封诣京尉候利

一封诣教成东阿

右三封居延丞印八月辛卯封 八月辛丑日舖

时驛北受橐佗莫尚亭卒单崇付沙头亭卒周良

二八八·三〇 图一一三 文一三〇

上面大体上把我的释读写了出来，但问题很多。所谓“南书”，也见于简（17），就是寄往南方的邮件，在这一简中是指从居延经肩水寄往张掖方面的文书。这支简是一起寄往南方的五封邮件上面贴的清单，第二段写的是清单的内容，五封之中的“二合檄”是由张掖城司马寄给设屏右大尉府的书简，没有写发出日期，其他三封是居延丞在八月辛卯发出的信件。最一段写明在驛北亭收发信件的情况。意思是说，这件信发出后第十六天辛丑日午后，橐佗候所属莫尚亭邮卒单崇把它收下，交给了沙头亭卒周良。如劳榦的释读，“设屏”似乎最好读作“護屏”。这样读的话，就可以认为在《汉书》上，由于字形近似而把“護”字误写为“设”字了。据《王莽传》载，在王莽时期，都尉改名为太尉，所以，太尉就是张掖都尉。简上既然写着右太尉，就可以推测在王莽时期也没有左右两都尉。但问题在于发信人张掖城司马，因



为张掖虽改为護(或设)屏,但在简上仍用旧称张掖,这一点也是很奇怪的。城司马是理应驻在都尉府的军官,所以,我也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从远离都尉府的地方发信。固然,我们也可以认为他可能是从张掖出差到居延,并从居延给上级发了信来,不过,我总怀疑张掖城司马这种释读法是否正确。尽管如此,我还想不出一个好的主意,把它改读为别的字。另一个问题是,前面已经说过,王莽时期把居延改称居成,而在第二段写的居延丞印仍然是“延”字,很难把它读作“成”字。并且,三封信的收件人地址也难以释读,但其中有一封写的是“京尉”,它就是《王莽传》载的“分三辅为六尉郡”的六尉郡之一。据《三辅黄图》载,京尉统辖从渭城到安陵西北方旬邑和义渠的十个县。然而,我对于自己释读为“候利”的县,还不能判明它是什么地方。总之,问题是很多的,但可以肯定这支简是王莽时期的简。并且,“设屏”如果能读作“護屏”,那末这支简就能纠正《汉书》的错误,所以这支简就更加重要了。我希望今后能得到更好的释读,努力引出新的事实。

我对于这支简中理应写为“居成”,却写为“居延”的问题,感到奇怪,不过,简(30)也是一个同样的例子。简(30)虽缺少下部,但因写着“始建国地”,所以下部原来应该是写着“地皇某年”的,因而我把它列为有纪年的王莽简了。但是简(30)把应写为“居成”却写为“居延”,并且在里名之上又缺少了应该写的“间田”两字。可以设想,这些情况可能是在王莽以后记下的履历。因此,严格地说,简(30)虽不是王莽简,但是我决定还是把它作为有王莽年号的简加以保留。

### 三

上面谈了以年号、地点作为标准,现在要谈以人作为标准来挑出王莽简的问题了。关于作标准的人,有一种是简(36)、(37)